

二元复合性下的康定与明正土司

——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

宋 灵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以清末民初的康定土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康定、明正土司的二元复合特征的描述,揭示了康定地区的生态、文化、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的相处模式,客观展现了历史上的土司生活世界,勾勒出康区社会在明末清初的变迁历程。

关键词:二元性;康定;明正土司

郑少雄先生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以清末民初的康定明正土司为研究对象,以康定这个位于“藏彝走廊”“中间圈”的特殊地方为田野点,采用门德尔班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以及王铭铭关于人生史论述的方法,将末代土司放置在明正土司家族史、康定历史以及与外部互动的历史中来考察。综合运用了各类原始档案、方志、调查材料、官修史书及旅康人士的回忆录和游记,结合人类学口述访谈和田野调查的方式,客观展现历史上的土司生活世界。作者通过对康定明正土司的研究,解答了历史上土司制度下的康区摇摆模式以及政权和教权如何共处等问题,为汉藏民族关系、王朝与边疆关系研究开辟了新视野。尽管作者运用了二元性、政治钟摆、对抗性涵化等理论来讨论康定地区的政治变迁过程,但笔者认为,二元性的解释方法更能还原康定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末代土司形象的灵动性。二分法、二元对待论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比如,中国古代有“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说。在西方。这种观念更是根深蒂固,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笛卡儿,逐渐确立了以主体与客体二分式为主导哲学,至黑格尔集“主客二分”之大成。^[1]

一、康定的二元复合性

康定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交汇处的横断山脉中心,从康定的南门和北门向西翻越折多山被称为“出关”或“走草地”,关外海拔高条件艰苦,汉人如果没有藏人及其牦牛驼队的协助,想要入藏几乎寸步难行;从关外进入康定成为“入关”,因为折多山以东因为海拔太

低的缘故,藏人们也相信他们自己和牦牛都无法居住在康定以东,如雅安、成都等地。在地方观念中,康定本来不存在,它是一夜之间从自然界跨入人文状态的,它的出现的原因是为了应对藏汉茶马互市的需要。^[2]康定旧称“打箭炉”,这个名字的来源总的来说分为两种:一是出自汉人的命名,如诸葛亮派遣郭达将军造箭和“诸葛亮借一箭之地”的传说,二是藏语方言“达折多”的变音,“达折多”字面意思有雅拉河与折多河、销售优质丝绸的谷地、山巅经幡下的河谷、玩箭的河谷。汉藏两种不同的命名来源中:与箭有关的传说是受汉人的影响,两水交汇说明了地理特征,经幡是藏传佛教的象征,销售丝绸则说明了这里是汉藏贸易的地点。“打箭炉”首次在汉文文献出现于明初,“康定”是清末赵尔丰在“改土归流”期间改打箭炉直隶厅为康定府而得名,取“康区大局底定”之意。从生态特征和名称的由来上已经可以看出康定作为汉藏贸易“中转站”和政治要地的二元复合型,这种特性还体现在由经济贸易和政治需要衍生出的“锅庄”和“乌拉”体系上。“锅庄”几乎都和明正土司建立了臣属关系,有的还是姻亲关系,锅庄兼具客栈、仓库和交易所的功能,锅庄的二元性在于:一方面,从关外来的客商不直接向汉商手中购买茶叶,也将土特产品销售给汉人,而是有锅庄主代为办理,并且为藏商免费提供食宿等庇护;另一方面,锅庄主促成汉商和藏商之间的有效沟通和达成交易,为汉商债务提供有效担保,且锅庄主的收入来自汉商给予的提成。“乌拉”专指康区百姓为内地公务人员出关提供的强制性人畜力役^[3],在土司的动员下,依托下属的千户和百户由普通百姓及其牦牛、骡马组成的交通网络,运送汉人官员和军队进出藏区,乌拉成为土司协助汉人出入藏区的有力保障,同时也成为土司与汉人协商和谈判的工具。锅庄原本是实现汉藏交融的有效方式,却又在无形中将汉藏双方隔离

作者简介:宋灵(1986—),女,藏族,四川省阿坝州人,硕士研究生,单位: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民族与理论专业,研究方向:当代民族问题与政策。

开来；乌拉的存在链接了由生态因素拉开了的汉人和藏人之间的距离。二者的结合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康定作为汉藏文化过渡地带的二元复合性特征。

二、土司的二元复合特征

明正土司作为康定的地方政治力量起源与元朝，形成与明代，在康熙皇帝平定“西炉之乱”以后，明正土司作为汉藏之间“桥梁”的模式就基本确定了。土司权威的二元性表现为：一元来自中原朝廷的政治授权，以土司和衙门为象征，一元来自西藏的宗教权威，以喇嘛和金刚寺为象征，这种二元性是土司制度维持下去的内部动力，如果来自汉地或藏地的力量试图打破土司的二元性，明正土司便会在汉藏两股力量之间开启“钟摆模式”，这一点在末代土司甲宜斋身上尤为突出。一方面，土司对中央王朝紧密相随，对钦差大臣的身体性的空间政治、追随帝国的功业参与征服地方叛乱、向汉人官员宣称与皇族的血缘构想都表明了土司对中央权威的高度攀附；另一方面，在改土归流时期，土司社会倾向于西藏方面，帝国在试图废除土司的同时，也极力打击康区的喇嘛教的势力，当土司在格鲁派喇嘛的策动下发生叛乱时，土司的政治钟摆彻底摆向了西藏。作者描述的钟摆模式与利奇只关注到结构变化的内部动力不同，在土司的政治循环中，存在内部与外部两种动力，内部动力是土司极力维持作为汉藏双重边陲的文化特征，这一可以同时容纳中央政权和喇嘛教权的模式是土司理想的政治模式，即“拿起铃铛是活佛，放下铃铛是土司”；在政治内部循环中，存在着土司与喇嘛的二元对立关系，可表达为土司=(土司：喇嘛)，即“政教联盟”制度，土司代表政权，寺庙代表教权，二者的结合与相互配合才能完善对地方社会的统治，政教联盟内部的等级关系是在历史进程中是可以互换的，但政权始终是涵盖教权的。土司政治的外部动力是喇嘛郡县化与汉人郡县化的争夺最终启动了钟摆模式，但土司社会的摆动并不完整，它不是以摆到中原王朝和西藏的总结政治两个终点为目的，其目的是以中原王朝的册封、认可或授权为依托，从而土司的政治权威寻找权力的外部来源^[4]。在这种政治循环中，便发生了作者用来说明土司各种行为的关键理论——“对抗性涵化”：与一个文明中心保持适当距离，维持适当差异，正是因为另一个文明中心的吸引^[5]。在汉藏两个文明中心的共同作用下，“对抗性涵化”发生了，并且是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同步进行。土司的二元性是土司家族主动选择的结果：向东去接受朝廷的封号成为土司，进入帝国的体系并获得位置；向西去往西藏

接受严格的寺庙教育，成为喇嘛获得“格西”，当这两种身份不能集于一身时，就出现了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侄子到西藏出家，而甲宜斋以第二继承人的身份成为明正土司。这就使得土司家族不论是向东还是向西，他们获得的外来头衔与成就都会带到本地社会，以增进土司家族在本地社会的威望。

三、总结

作者通过口述访谈和田野调查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访谈上百人，获得口述资料30万余字，收集了大批的文献资料和档案，为解读康区的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和谐共生内在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大视角下，结合人生史的研究方法，发展了“钟摆理论”，运用“对抗性涵化”的解释方法，向我们展示了在土司主导的具有二元“文化复合型”特征的康定世界，描述了土司与喇嘛二元对立的政教联盟的土司政治结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作者对康区内部多样性、复杂性的分析，为正确理解汉藏关系的发展方式提供了借鉴意义，乃至对理解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创建和谐边疆社会提供了来自历史的智慧和新思路。但是对于如何发展藏汉关系，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及，仅在最后以隐喻的方式表达，“父母通过孩子达成最稳固的关系”。历史上，康巴藏区土司制度为平衡汉藏关系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历史实践，康巴藏区作为发展与传承中国文明的重要区域，可为当下推动宗教中国化提供历史的智慧。笔者认为，作为历史上汉藏文化交融地区的康定，乃至整个康巴地区都具有两种不同文化“过渡地段”的特征，在历史进程中该地不断与周边文化进行交流碰撞，强化了康区作为汉藏文明的边缘和连接地带的重要性，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如何运用自身文化的特点和优势，积极融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张立文.和合方法的诠释[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3)
- [2]郑少雄.康定如何表征汉藏关系—文化认同在城市景观中的实践[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 [3]郑少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 [4]张连海.钟摆理论的发展——读《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